

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

〔日〕小川原正道 著

尤一唯 译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福泽谕吉

[日]小川原正道 | 著
尤一唯 | 译

与日本政府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 / (日) 小川原正道著 ; 尤一唯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08-4606-9

I. ①福… II. ①小… ②尤… III. ①福泽谕吉 (1834-190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31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9094号

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

作 者	(日) 小川原正道 著 尤一唯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 875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606-9
定 价	28.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不愿为官的福泽谕吉

相较而言，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在中国的名气不算太大，尤其是历史上毕业于庆应大学的中国校友总体而言乏善可陈。稍微可以举出的近代人物只有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但稍微熟悉日本情况的人想必都知道庆应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他是日本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在被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纸币上，可谓是日本的“国脸”。

对中国而言，福泽谕吉有着十分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他被理解为日本的启蒙学者、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的“民权家”；但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个积极主张侵略亚洲近邻的鼓吹者的“国权家”。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他作为侵略的“国权家”的面相在中国越来越被强调。

本书的作者小川原正道先生跳出了以上两个主流的研究方向，而是聚焦于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一直以来相对被忽视了的课题。本书虽然巧妙地回避了以上争议最大的问题，

但在中国论及福泽谕吉时我们还是避不开上述问题，因此我想在读者开卷之前简单补充介绍一下日本学界近来围绕福泽谕吉评价的新的争论。

其实中国学界对福泽谕吉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学界对于福泽谕吉讨论的延伸。在日本学界近来由安川寿之辅和平山洋之间进行了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安川·平山之争”，争论的核心便是围绕对福泽谕吉的评价问题，这也是福泽谕吉影响力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回响。

安川先生主张福泽谕吉才是日本在近代不断侵略亚洲并最终踏入毁灭性的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由于安川先生的观点和译作已经被相对广泛地被介绍到国内，在此不再累述。客观而言，安川寿之辅的主张和结论并非全新，在日本战败后便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战败后不久的日本便有类似于“安川·平山之争”的争论。当时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认为福泽是尊重精神个体独立以及社会多元化的市民自由主义者。但远山茂树和服部之总等左翼学者针锋相对，认为福泽是天皇制的赞美者，是主张侵略中韩两国的侵略鼓吹者。只是相较以往学者相对重视方法论而忽视史料考据的研究方式，安川先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基于文献分析的实证研究。

相较而言对于国内平山洋的结论介绍的内容较少。简而言之，平山洋的方法并未局限于缜密的实证研究，而是提出了更新的“史料批判”方法。他对被认为是研究福泽谕吉的第一手史料的二十一卷的《福泽谕吉全集》，尤其是其中九卷是表达了露骨侵略思想的大多没有作者署名“时事新报评论集”的真

实性表达了质疑。

平山洋认为，露骨地表达侵略思想的《时事新报》的社论大多并非出自福泽谕吉本人之手，而多出于其门生们尤其是石河干明的笔下。作为大正版《福泽谕吉全集》的编辑者，石河干明将很多出自自己手下的作品“假借”福泽的名义塞入了全集。尤其是在大正版《福泽谕吉全集》出版时，和福泽本人有过交往的友人、门生大多都已去世，因此石河干明的“篡改”便死无对证。而最近的昭和版的《福泽谕吉全集》的编辑者富田正文是石河干明的学生，他也是对石河干明的“篡改”不加以批判，才造成了现在人们对福泽谕吉“侵略者”的印象。

他认为福泽谕吉确实表达了对中韩两国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基于感性的蔑视而是根据一定的基准的批判。而这基准就是福泽在1866年的著作《西洋事情》中提出的“文明政治的六个条件”，即尊重个人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科学技术的振兴；推广教育；有利于实业的政治和充实国民的福祉。因此平山洋认为福泽对于亚洲近邻的蔑视并非是“无条件”、无来由的情绪性批判，因此随着中韩两国自身的改变，若他们往文明政治靠拢的话福泽无疑是表示欢迎的。尤其是非常珍贵的能反映晚年福泽对中国看法的两篇社论“中国人可亲”和“关于中国的改革”（在附录中附上两篇社论的翻译，以供读者自己品评、研究）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对中国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百日维新”表达了乐观其成的态度。由于福泽在同时期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因此平山认为这两篇社论无疑出自福泽本人之手。但是由于福泽在此后不久由于

脑溢血病重（1898年9月26日），虽然此后从病中痊愈，但是福泽因后遗症脑部受损并失语，因此失去了创作的能力，没能更进一步地展开自己的论述完成自我的“修正”。总之，平山洋认为福泽并非“亚洲侵略者”，而是“亚洲独立”的主张者。他通过将自由主义的福泽谕吉和他主张侵略主义的学生的切割描绘出了内外都彻底贯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福泽谕吉形象。

两者之间以及两种观点围绕福泽谕吉评价的争论相信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会继续进行下去，在此仅简要介绍其大略供读者自己评判。

回到本书，本书日文的标题为『福沢諭吉「官」との闘い』，其中“官”意指的是和“人民”相对的政府之意，而“闘い”指的是斗争之意，因此中文将书名意译为《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由于全书不仅涉及了福泽和明治政府之间复杂的斗争、利用关系，还涉及了大量福泽身后的故事。例如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政府希望再次“利用”福泽，对其追赠勋位结果被其门生拒绝的轶事，也涉及了福泽的著作在日本战时如何受到审查和抵制的故事，还有就是福泽在战后如何被GHQ盟军政府再度“利用”的故事。严格来说虽然GHQ是美国人的政府，但是在战后初期承担了日本政府的角色，因此将日文标题中的“官”定位为“日本政府”。

前面提到本书通过这样的安排巧妙地避免了对福泽评价中争议最大的各类问题，而更多地聚焦于福泽谕吉相对正面的一面。但是小川原先生也曾其他地方间接提及此问题，他认为福泽谕吉终身身为在野的知识分子，因此有着不同于现实中政

治家的一面；相比于现实中推动侵略政策的政治家，他不应该承担与政治家同等的责任。此外在明治中后期日本的言论界，福泽几乎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失去了引领舆论的能力，即使那些鼓吹侵略的文章确实出自其手，大概影响力也十分有限，那么将他等同于战犯是否妥当呢？

丸山真男曾经提及在中国对于福泽谕吉研究的“意译”比“直译”更为重要。在此就简要谈及一下本书翻译的动机。在中国一直以来有着“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的传统，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甚至在明太祖时期还禁止了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不仕”的权利，可见在中国身为在野知识分子之很难。因此希望这样一部描绘在“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的传统同样深厚的日本，一位在野知识分子凭借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掌握国家机器的政府之间展开艰难斗争的作品，能在中国得到最大的“意译”而超出纯粹学者式的志趣范围。（如丸山先生所言）

就译者个人而言，福泽的学说和观点即使抛开那些主张侵略的内容，对于身为中国人的译者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可言（或许是因为笔者才疏学浅，缺乏丸山先生所言的“意译”的能力），反倒是福泽的生平事迹更能吸引译者。尤其是每当触及福泽一生坚持的独立创业、在野精神时总能被他那份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所感动。庆应大学三田校区建立于一个小山坡上，若要进入校园需要沿着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不知这是否是校园的创立者福泽先生在提醒着后辈的人们、自己独立创业的艰难以及在世间实现个人自立以及追求学问之道的路途艰难呢？

小川原正道先生是笔者在庆应大学学习期间的恩师，在此希望此译作能作为对恩师教导的回报以及自己在日本学习的最好纪念。我也希望在此对一直以来支持我学习、生活的恩师、父母、亲朋好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以及疏漏，文中翻译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读者们的谅解与指正。

尤一唯

2016年3月4日

译于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

本书为小川原正道著:《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日文书名为:『福沢諭吉「官」との闘い』,文艺春秋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中文译本。

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者和记者,在今天的日本仍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他的头像被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一万日元之上。在日本学界,石河干明、丸山真男、富田正文、松泽弘阳、小泉信三、安西敏三等学者对福泽谕吉的思维结构、生平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如果就研究的全面程度而言,福泽谕吉可以说在所有日本思想家之中鹤立鸡群。

在本书付梓之际请允许我赘言几句本书的写作动机。本书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的福泽谕吉和“官”(政府)的关系。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是“官民调和”的主张者。他认为政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诉诸镇压和强迫;而人民也不应该只想着攻击、打倒政府,因此他呼吁

的是双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而在政治体制上，通过选出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由议会中的多数派组成政府，再通过若干年份后的选举实现政权交替。他希望通过此举将“民意”反映在政府身上，因此呼吁引进议会内阁制。

但是，在现实之中福泽谕吉看到的尽是官民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员一味压制人民的言论、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人民一味想打倒、消灭官员。议会内阁制也未能制度化，因此出现了阻绝官民的“超然内阁”。作为“官民调和”论者的福泽谕吉也被政府误认为他站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受到来自政府一方的种种攻击。在明治十四年政变时，福泽谕吉被政府怀疑与大隈重信联手意图打破萨长藩阀统治，他的门生也多失去了在官场的位置。其中最忌惮福泽谕吉的是井上毅^[1]，他认为交询社私拟宪法案的背后的黑手便是福泽谕吉本人，此外他还认为福泽谕吉创设的社交俱乐部交询社意欲笼络全国多数国民，以便结成政党。而且福泽谕吉在《帝室论》一书中力陈政治和皇室分离之说，而井上毅强烈反对这种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两者以福泽谕吉一手创办的庆应义塾为战场展开了拉锯战，政府在征兵宽限一事上区别于官立学校、严苛对待作为私立学校的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为了收复失地也不得不四处奔走。福泽谕吉和他的门生、庆应义塾、交询社、《时事新报》都成为政府的监视对象，警察也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1887年福泽谕吉甚至险些因政府出台的保安条例而被驱逐出东京。

福泽谕吉一向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叙位、叙勋、受爵之事，一生坚持以在野身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虽然在福泽谕吉

在世时没能实现“官民调和”，他宣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理念也在总体战体制时代被日本政府列为违禁之物。但是在战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又被美国占领军重新拾起，由于日本政府本身的更新换代，因此对福泽谕吉的评价也为之一变，他作为民主主义论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而得到官方的弘扬，此后他更是登上了一万日元的纸币。但此事并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决定的，而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来为他定性的，这么一来福泽谕吉仿佛成为了一直站在政府一面的代表，这对于一直主张官民调和论者的福泽谕吉而言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在坂野润治的《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2]一书中，有对福泽谕吉的官民调和论的敏锐分析。由于此书的中文译本已经出版，故在此简单提及，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丸山真男在中国出版的《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读者不要受日本对福泽的先入之见或流行观念束缚，应亲自根据福泽的论著去理解福泽为自由和独立所作的思想苦战。如果我的研究能对作出上述努力的读者提供某些启发，我将感到非常荣幸。^[3]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在思考此书的译序时，和丸山先生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思想上的艰苦战斗——福泽谕吉的著作中一直涌动着这种斗争的精神，本书的副标题也意指这种斗争精神。福泽谕吉到底胸怀什么样的想法和政府对峙，和政府接触，并受到政府什么样的对待呢？丸山著作的

译者区建英女士曾记述自己与丸山先生相遇，并为丸山先生的批判精神、严密的论证和创造性的思考所感动最后决意将此书的翻译的经历。^[4]笔者也希望通过这样批判性的实证分析来考察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

丸山先生译作的篇幅较长，不知道在中国是否起到了福泽谕吉研究入门书籍的作用。中国翻译的有关日本学界对于福泽谕吉研究的著作在此后依然层出不穷，尤其我听说近来安川寿之辅的著作大受译者的欢迎，并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的好评。^[5]

安川先生的福泽谕吉研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学术上的争论，这种争论持续至今，但是似乎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反对安川先生观点的译作问世。就此来看，可以说中国学界目前处于偏听一方的观点的状况，我对这种现象多少感到有些疑惑。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加入上述的争论，而是希望能为福泽谕吉研究提供更加客观、多元的视角。

此外本书由笔者的学生，来自中国温州的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的尤一唯同学翻译。我在此衷心对尤同学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2016年3月4日

小川原正道

[1] 井上毅（1843~1895年），明治时期日本的政治家，曾出任法制局长和文部大臣，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军人敕语》等敕令、法令的起草有着巨大的影响。——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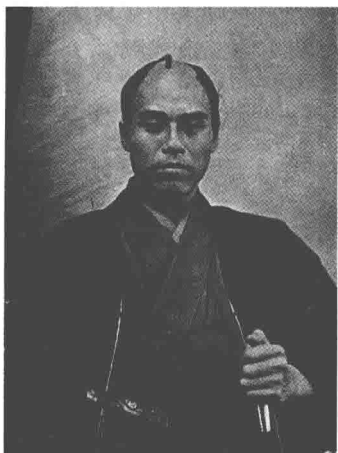
[2] 参见：坂野润治著，崔世广、王俊英译：《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7~88页。——译者

[3] 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10页。——译者；丸山真男著，松泽宏阳编：《福泽谕吉的哲学 他六编》，岩波文库，2001年，287页。

[4] 区建英：“对自由、民主的深深眷恋”，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二卷月报，岩波书店，1996年，3页。

[5] 安川寿之辅著作的中文译本有：安川寿之辅著，孙卫东、徐伟桥、邱海水译：《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安川寿之辅著，刘曙野译：《福泽谕吉的战争论与天皇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安川寿之辅著，刘曙野译：《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构丸山谕吉神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译者

序： 伟大的人民



▲ 文久二年（1862年）摄于巴黎

宫武外骨^[1]活跃于明治昭和年间日本的新闻界，被新闻史研究者所熟知，他在1926年出版的《明治密探史》（有限社）中写道：

政府不断往东京三田的庆应义塾派去走狗，特别是在福泽谕吉发表赞同民选议院的论调，以及大隈重信连同庆应出身的党员一同请辞之时派去的走狗尤多。（《宫武外骨著作集》第二卷，454页。）

文中的“走狗”指的是密探的意思。福泽谕吉发表赞同设立民选议院的意见是在1875年；他开始积极地呼吁开设国会是在1879年；大隈重信连同庆应义塾出身的参议（相当于现在的内阁阁僚）同仁一同辞职是在明治十四年（1881年——译者注）

的事。而“官”（政府）大量派出密探到庆应义塾和福泽身边来监视他的动静也恰好是在这个时候。

事实上在政府的公文、政府首脑的个人档案，特别是当时担任密探总管的警视总监三岛通庸^[2]的个人档案中也留下了许多清查福泽谕吉和他亲信动向的报告。（「寺崎修、都仓武之「史料 密探报告书 / 福泽派的动静等—明治十四年政变前后、1887 年保安条例前后」（『福泽谕吉年鉴』三一、2004 年）」を中国語訳して下さい）福泽和他设立的庆应义塾以及交询社（社交俱乐部）、时事新报（日报）都成为了警察重点的监视对象。

一提到福泽谕吉，人们很容易想到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最早将西方文明引进日本、在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在言论界、学界、教育界都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以及现在被印在日本“门面”——一万日元纸钞上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被打上危险的标签被政府所监视呢？

这是因为福泽所说的、主张的、提倡的以及在他影响之下的门生和组织的动向不能被当时的政府所允许。在福泽开始受到严密监视的 1875 年~1881 年之前，他的活动一直以介绍外国知识、介绍并输入文明为主。此后福泽将自己著述活动的主轴转移到了自身的理论建构以及对政府和舆论的政策建言之上。他的政策建言广泛地涉及了有关国家根本的各种议题：作为解决不满当时政府、在各地进行武装暴动的士族的对策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解决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士农工商不平等、言论自由化、以英国为模板的议会内阁制、两党制为主轴的早期国会开设以及天皇不掌握政治实权，只作为政治、文化的权

威发挥作用的英式君主立宪制等。他的论点见诸当时的畅销书《西洋事情》和《劝学篇》^[3]之中，并在自己事业的根基庆应义塾的经营走上正轨后、成立交询社社交俱乐部（交询社常被视为政党），并发行报纸《时事新报》。这也是他个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顶点的时期，他也在此时不断地向朝野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也恰逢在野势力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声势不断上涨，与福泽关系亲密的大隈重信等人结成政党，相继发行反对政府的报纸，士族和豪农势力通过结社活动在各地崛起。

前述的政治构想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而言可谓是理所当然的。现代日本采取了象征天皇制、议会内阁制，并通过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近年来还发生了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的政权轮替；而地方分权，也是当下正在处理的重要政治议题。但是对于当时的明治政府而言这些内容以及福泽的影响力都是十分值得恐惧、警戒的思想。对于萨长藩阀政府而言因为选举的结果而失去政权的两党制和议会内阁制着实是令他们恐惧的制度。对于树立以普鲁士为样板的有着强大君权的立宪君主制为目标的政府而言，统而不治的英式君主制是无法接受的。研究福泽政治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的知名学者寺崎修（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下文的头衔都指当时的称谓）认为：

福泽主张开设国会并通过选举让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接手政权的议会内阁制……在明治政府的要人看来（相比行政机构更重视立法机构——作者）相比民权运动家的观点，福泽的政治构想更为危险。（寺崎修《福泽谕吉的近代构想》，第205页。）

1882年四月，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作为当时最高领导